

以往的歷史是處在民主自由與外在專制的鬥爭之中，「後歷史」的人類將在民主自由制度的框架內，面對自身的矛盾而需要進行鬥爭。人不是上帝，可以超越有限與自由的矛盾與辯證運動。那麼，後歷史的人類是否將為着某種超越而鬥爭呢？

正處在尷尬的境地，他們發現自己正在捍衛着過時的社會秩序。這樣，共產主義對自由民主制度形成的意識形態威脅現在已經結束了。尚沒有一種更好的制度可以超越自由民主制度下人們對它的認可。

福山用了較多篇幅闡釋歷史終結後的「最後的人」及其生存狀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顯得繁瑣和乏力。福山注意到了「最後的人」所面臨的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以及生活在沒有鬥爭的世俗中的某些無聊，一如1968年法國學生的舉動，對於仍在為獲得認可而鬥爭的尚在歷史中的國家的人們來說，頗覺不可思議。人類還面臨着文化豐富性與多樣性的喪失的問題。福山沒能提示後歷史社會的實質性問題。

因此，在被福山終結的地方，我們開始追問後歷史的社會中人類的困惑與希望。如果我們認可福山對歷史的終結，那也是意味着人類獲得認可的鬥爭的完成。人類還面臨着新的問題，也許得開啟一種新的歷史。蒂里希 (Paul Tillich) 認為，「人是有限的自由」，人的存在就是有限與自由的辯證運動。既然如此，在歷史被「終結」的地方，人類要開始一輪新的進程，以往的歷史是處在民主自由與外在專制的鬥爭之中，「後歷史」的人類將在民主自由制度的框架內，面對自身的矛盾而需要進行鬥爭。人不是上帝，可以超越有限與自由的矛盾與辯證運動。那麼，後歷史的人類是否將為着某種超越而鬥爭呢？

作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 新古典經濟學

● 盧周來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著，周立群、韓亮、余文波譯：
《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的《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是作者在1990年4月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維克塞爾論壇所作的系列講座基礎之上，擴充而成的一部專著。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人類社會大轉折的時間段。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與轉向，使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享有的榮譽達到了歷史的巔峰。於是，與「歷史終結論」相對應，經濟學也彷彿走到了終結處：以論證「自由市場制度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率的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新古典經濟學，一時之間也大有成為經濟學領域「唯一」之勢。因此，斯蒂格利茨的聲音此時顯得突兀而另類，他似乎扮演了另一個「終結者」的角色：即「經濟學終結論」的終結者。在東西方學者跨越界限團結到「華盛頓共識」的門下，並不免有些誇張地狂歡之時，斯蒂格利茨就像一隻夜梟尖叫着掠過，以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最系統最全面的批評表明：經濟學新的分裂已經開始。

在斯蒂格利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中，我最看重的莫過於他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新古典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時候，它本身也具有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性質。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在其名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中首先區分了兩種「意識形態」，即意識形態的「特殊概念」與「總體概念」。前者是指「被看作對某一狀況真實性的偽裝」，但卻區別於謊言，因為這種偽裝由起初的有意識或半意識，最後發展到了無意識，自己被偽裝後的觀點給說服了。所謂意識形態的「總體概念」，則是指某個被歷史地決定了

的社會階層以不同於其他階層的思維範式進行思維。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共同點就是「向自己歪曲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其方法是將它們神化、浪漫化或理想化」。通過斯蒂格利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新古典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是如何扭曲了現實經濟世界的。

我們知道，新古典經濟學的全部觀點都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下，即信息完全化，即經濟人能夠免費獲得所有的信息。在信息完全化的假設下，新古典經濟學得出了市場能夠完全出清的結論，並在此結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福利經濟學兩大定律。現實經濟世界卻與新古典經濟學所構造的那個完美高效的自由競爭世界恰好相反：有太多的買者找不着賣者，有太多的賣者在尋找買者；市場完全出清與市場無法出清相比較，幾乎成為了不可能發生的「小概率事件」。新古典經濟學如此背離現實經濟世界，原因就在於其關於信息完全化的假設。一旦將這個虛幻的假設推翻，將經濟學研究回歸到更反映現實世界的「信息不完備」前提之下，新古典經濟學所有的結論都得改寫。這就是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指出：「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標準信息假設方面的輕微變動，將徹底改變標準新古典理論的所有重要結論，因此這個理論最終是站不住腳的。」斯蒂格利茨在信息不完全的基礎之上，推翻了包括市場出清以及福利經濟學兩大定律在內的幾乎全部新古典經濟學結論。

與「歷史終結論」相對應，經濟學也彷彿走到了終結處：以論證「自由市場制度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率的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大有成為經濟學領域「唯一」之勢。在新古典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時候，它本身也具有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性質。

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過程恰與「意識形態」產生的過程相吻合。曼海姆曾經揭示出，某一觀點與陳述之所以會上升到「意識形態」，是由敵對雙方的思想衝突造成的。馬歇爾、庇古等人所奠基的新古典經濟學，就是為了對抗當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產生的。

僅僅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扭曲不足以證明其是意識形態，因為有意識的扭曲就是說謊；但我們確又不能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在有意識地說謊。相反，我們發現，由信息完全化假設，到完全競爭性市場理論的提出，再到「瓦爾拉斯均衡」(Walras' Equilibrium)以及「阿羅—德布魯定律」(Arrow-Debreu Theorem)的證明，最後到「帕累托 (Pareto) 境界」的描述，新古典經濟學家一步步完成了「斯密 (Adam Smith) 之手」的論證。這一過程的完備與自恰，以及對數學及其他無價值判斷的科學工具的應用，足以使新古典經濟學家以及後來在他們的引導下進入他們的邏輯世界的所有後世經濟學家，都不能不被這一體系之精緻和圓滿所折服，此時誰還會想起如此精緻而圓滿的體系竟然是建立在子虛烏有的「信息完全化」假設之上的呢？

還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過程恰與「意識形態」產生的過程相吻合。曼海姆曾經揭示出，某一觀點與陳述之所以會上升到「意識形態」，是敵對雙方的思想衝突造成的。十九世紀60、70年代，由薩伊 (Jean-Baptiste Say)、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庇古 (A. C. Pigou) 等人所奠基的新古典經濟學，就是為了對抗當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產生的；二十世紀30年代是左翼經濟學的黃金歲月，甚至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受到左翼經濟學影響而有「淡紅色」之嫌，於是才有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等經濟學家

在與形形色色的左翼經濟學進行論戰，捍衛並完善了新古典經濟學；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正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凱歌猛進的時代，為進一步與左翼經濟學分庭抗禮，以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拉弗 (Arthur B. Laffer) 等為首的「供給學派」以及以盧卡斯 (Robert Lucas) 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在鬥爭中再度將新古典經濟學推進。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天然地與左翼經濟學對抗着，也正是在不斷升級的衝突中，新古典經濟學一步步完成了由一般陳述與觀點向「意識形態」的躍遷。

在點出新古典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質之外，斯蒂格利茨還揭示了這一學說的「烏托邦」性質。

對於「烏托邦」這一概念，曼海姆同樣區分了兩種「烏托邦」。前一種是我們常識中關於烏托邦的觀念，即「經典烏托邦」，它指強行推行原則上不能實現的關於某種秩序的思想。曼海姆的意義在於指出了另外一種烏托邦的概念，即由「保守主義導致的烏托邦」或者稱「保守型烏托邦」，這種烏托邦思想僅承認「托邦」(現存秩序)的合理性，而把「托邦」之外的一切可能性視為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在斯蒂格利茨的書中，新古典經濟學恰同時具備了這兩種「烏托邦」特性。

典型的資本主義本身具有演進的特徵，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對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其實並不大。這點就連身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 都

承認。在《作為布道者的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一書中，斯蒂格勒說，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有限政府」，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美國政府財政佔GDP比例恰在一個據說奉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那裏上升得更快；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批評公正妨礙了效率，但西方政府財政中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也在不斷上升，連里根總統也堅持不會取消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編織的「社會安全網」，相反，弗里德曼等人的「負所得稅計劃」受到政府的嘲笑。因此，斯蒂格勒自嘲地說，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似乎顯得有些「反智」。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的「經典烏托邦」性質，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軌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由學院走向政壇，以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標準模型為藍圖，向轉軌國家強行推行以激進私有化為核心的各種改革方案。由於這些方案本身與轉軌國家的現實並不切合，最後導致了前蘇聯與東歐國家十幾年的持續衰退。尤其在俄羅斯，一個理想中的自由市場秩序並沒有建成，俄羅斯至今也未被國際社會承認是市場經濟國家，相反，一個幾乎以各種潛規則以及黑社會網絡主導的經濟秩序倒填補了制度空缺。對此，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批評道：「許多轉軌國家正處於災難困苦之中，在我看來，標準經濟模型對此應負部分責任。」他還在書中逐一反駁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轉軌國家推行的包括「產權改革」在內的種種「神話」。

斯蒂格利茨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批評蘭格(Oskar Lange)等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型」。在斯蒂格利茨看來，最能體現新古典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上共性的，莫過於「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與新古典模型的同源性。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型」並不是市場經濟，其要義在於「政府模擬市場運用價格槓桿對資源進行配置」，而這一構想竟就來源於新古典經濟學中關於「瓦爾拉斯均衡」的論證。在論證「瓦爾拉斯均衡」中，新古典經濟學家引入了一個「假想的拍賣者」，這位拍賣者報出一組價格，如果在這組價格下，市場供求不一致，他就修正報價，直到市場供求關係一致為止。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引入這位「假想的拍賣者」，就是為了說明，儘管會經過不斷的調整與試錯，總存在一組價格使市場達到供求一致的均衡狀態。蘭格在「市場社會主義模型」中，僅僅是將「假想的拍賣者」的角色實體化，並定位給了政府，即用政府的計劃機構取代了瓦爾拉斯「拍賣者」的反覆競拍。所以，斯蒂格利茨說：「如果經濟中的新古典模型是正確的，那麼市場社會主義則會成功；同樣的道理，如果經濟中的新古典模型是正確的，那麼中央計劃經濟所遇到的問題應比實際情況少得多。」不幸的是，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央計劃經濟都證明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性質，因而，作為同源性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具有同樣的性質。

斯蒂格利茨在書中研究了轉軌

新古典經濟學的「經典烏托邦」性質，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軌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由學院走向政壇，以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標準模型為藍圖，向轉軌國家強行推行以激進私有化為核心的各種改革方案，最後導致了前蘇聯與東歐國家近十幾年的持續衰退。

當下的中國也處於轉軌時期，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大陸主流經濟學界在拋棄了舊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同時，似乎也正在接受或構建一個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的新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當下的中國也處於轉軌時期，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大陸主流經濟學界在拋棄了舊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同時，似乎也正在接受或構建一個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的新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此時一讀斯蒂格利茨這本書，意義自不待言。

最後，我想鄭重推薦斯蒂格利茨在書中寫下的一段話，因為在我看來，這段話具有警醒的意義：

左派思潮與右派思潮之間也有某種共通性，即這兩者都被宗教般的狂熱所驅動，而非理性分析。當這種思潮在排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同時，他們吸收了自由市場思想。正如在蘇聯，儘管人們未必讀了多少弗里德曼的著作，但卻將他視為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僅僅就因為他是一種思想的象徵，而這種思想正是他們追求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信仰體系。

重建現代音樂美學之基石

- 李起敏



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



于潤洋：《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